



北京大学
PEKING UNIVERSITY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
INSTITUTE OF AREA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7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
学术简报



“博雅工作坊”第六工作间
伊朗：国际、地区和内部视角（上）
2018年5月17日上午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是北京大学开展国别与区域研究的综合性学术平台，是一个集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智库功能三项工作为一体的建制单位。它以各院系现有相关学科的研究基础为依托，充分尊重和利用历史资源和现有条件，动员北京大学多样化的学科力量和长期积累的国内外联系，整合和盘活各院系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梯队与物质要素，充分激发不同学科的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做到既面向国家需要，也面向学术的发展和未来人才的培养，拓展加深各学科的研究能力和潜力，构筑跨学科、全方位、多层次、有活力、协同合作、共同攻关的学科新布局。

区域与国别研究是将各国、各地区的地理、文化、经济、政治、社会、民俗、组织、制度及人类其它各种活动作为研究对象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是对包括本国在内的世界人文、社会知识及经济、科学技术发展所做的综合性研究，它的目标是构造全方位的知识体系，为世界整体与本国人民服务。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将坚持基础研究的思想导向，以学术为主导，面向世界重点国家、重点地区和重大问题开展基础性和前瞻性的研究，形成中国特色、北大优势的区域与国别研究范式，为我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及国际学术交流与发展贡献力量。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的工作范围包括：1) 学术研究，组织多种形式的学术活动，志在专门、深入、有创造意义的学术成果，向社会贡献学术思想；2) 人才培养，探索新的课程体系与教学模式，以适应区域与国别研究的需要，培养新型人才，使其既具备思考能力，也胜任实际工作；3) 智库功能，在研究与教学的支撑体系保障下就重大问题提供建言，为应对各种复杂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献言献策；4) 扩大国内外学术交流，延展学术网络与思想网络，吸收世界先进的文化成果，传递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将努力与国内与国外相关学术机构合作，取其所长，学其所能，并诚请同行的帮助与支持。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雅工作坊”第六工作间以“伊朗：国际、地区和内部视角”为主题，围绕着近期发生的与伊朗相关的重要事件进行了深入讨论，上半场由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钱乘旦教授主持，下半场由北京大学阿拉伯语系吴冰冰副教授主持。

钱乘旦教授首先简单介绍了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的基本情况。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是刚刚建立的一个建制单位，其主要任务是进行区域与国别方面的研究。在区域与国别研究方面，北京大学是有基础的，但是力量很分散。北京大学希望有一个平台将这些分散的力量整合，共同进行研究工作，因此成立了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会经常举办学术活动，通过工作坊的形式进行小规模深入研讨，相互交流看法。

首先发言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陆瑾，她从伊朗形势变化与中伊关系变化的角度谈了自己的思考。

从1991年至今，陆瑾每年至少去伊朗一次，在伊朗进行长期生活或者短期访问，因此见证了最近二十多年来伊朗国内的发展变化。从去年伊朗总统大选结束至鲁哈尼就职这一段时间，陆瑾在伊朗调研了两个月；从去年末延续到今年初的伊朗反政府示威活动发生后，她在伊朗调研了一个月。基于这些实地考察，陆瑾阐述了她对伊朗形势变化和中伊关系变化趋势的思考。



研究院简介

陆瑾认为，自 2017 年下半年以来，伊朗民众遭受了国内政治冲突加剧和经济低迷的双重压力，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并恢复对伊朗的制裁之后，伊朗国内强硬派借机发起对伊朗总统鲁哈尼的新一轮攻击。在外部，伊朗与以色列在叙利亚交火，导致伊朗民众更加焦虑。伊朗处于内忧外患的特殊时期，伊朗人称之为敏感时期。随着特朗普极限施压政策的推进，伊朗政府在维护国内稳定与应对外部挑战方面将面临严峻的考验。在这样的形势之下，陆瑾认为中国政府要坚持维护伊核协议的立场，利用外交资源多方斡旋，中资企业应该坚守伊朗市场。

陆瑾认为，特朗普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推出伊核协议的主要目的是遏制伊朗在地区不断扩大的影响力，同时特朗普认为现在是颠覆伊朗政权的时机。2013 年伊朗温和派上台后，伊朗统治阶层内部的政治斗争相对缓和，诸如伊朗议长拉夫桑贾尼和领袖哈梅内伊的国际问题顾问维拉亚提这些属于传统右派和中右派的人都加入了支持鲁哈尼的阵营。但是从 2017 年伊朗总统选举备选开始，尤其是拉夫桑贾尼的突然去世，伊朗政权内部的斗争加剧。鲁哈尼赢得总统连任之后，伊朗主要政治派别开始围绕 2020 年议会选举和下届总统选举进行布局。

陆瑾认为，伊朗国内的主流政治派别可以分为三个，第一个是以鲁哈尼为代表的温和派，但是他在赢得总统连任之后受到了多方的束缚，包括领袖哈梅内伊、伊斯兰革命卫队高官和伊朗强硬派，面对这样的局面，鲁哈尼的抵制是有限的，而且他自己也清楚在第二任期不会有所作为，因此退让了很多。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后，伊朗强硬派竭力削弱鲁哈尼的公众信誉。因此可以说，美国退出伊核协议的行为严重打击了伊朗国内亲美的鲁哈尼政府。

伊朗国内第二个主流政治派别是改革派，改革派在伊朗 2009 年大选中被边缘化，但是借助 2013 鲁哈尼当选

回到伊朗政坛，与温和派联合执政。支持鲁哈尼连任的绝大多数选票来自改革派选民。目前改革派正在部署独立参与伊朗下届总统选举。特朗普退出伊核协议之后，改革派坚定地支持鲁哈尼。

第三个主流政治派别是保守派，保守派从内贾德后期就处于分裂状态。温和保守派的政治立场与鲁哈尼的政治立场接近，而强硬保守派则攻击鲁哈尼的内政外交政策，代表新保守派和民粹主义的内贾德受到了传统保守派和改革派联盟的挤压。

陆瑾认为，伊朗国内的另一个问题是领袖继承人问题，哈梅内伊的继承人问题和后哈梅内伊时代伊朗政治体制问题也是未来的关键。现在哈梅内伊的健康每况愈下，有分析认为鲁哈尼在争取成为领袖继承人，而反对鲁哈尼的政治势力在全力阻挠。伊朗的政教分离及领袖制度在国内一直存在争议。主张政教分离的宗教人士长期被打压，现在伊朗的教士集团由于年龄等问题整体处于弱势，未来这一制度的走向难以预料。另外伊朗国内修宪的呼声很高，自 1989 年修宪之后，伊朗宪法与现实状况已有很多不符，需要与时俱进。

此外陆瑾提到，由于受国家发展理念、经济结构、治理能力和外部制裁等因素的影响，伊朗经济发展状况不尽如人意。在伊朗国内，国家安全优于经济发展。因为领袖只重视政权稳定，不关心经济发展，他只关心油气资源问题，掌控油气资源就可以维护伊朗政权的稳定。鲁哈尼集团引进外资的行为引起了领袖的担忧，他怕西方的意识形态随外资进入伊朗。鲁哈尼执政以来，受低油价和美国经济制裁等因素的影响，在经济上没有大的作为。

陆瑾认为伊核协议对伊朗是有利的，最起码能够保证伊朗的能源收入，而能源收入能够保证伊朗政权的稳定。

根据伊朗的一份公开报告，伊朗的经济腐败主要是决策、行政和执行部门体制的问题，一些政治体制的权利不是依靠政府执政的核心职责或者社会投资，而是通过出售石油和天然气来保证的，因此不需要精英阶层提供指导以提升社会的治理，政府、议会和执行机构都缺乏制度性的约束和监管。特朗普退出伊核协议可能是考虑到伊朗经济低迷，想通过这种手段向伊朗施压使其屈服。

第二个发言的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丁一凡，他发言的主题是“中国对外经贸关系与中伊合作。”

丁一凡提到，去年中国与伊朗的贸易增长了20%，但是中伊之间的贸易基数不大，中伊之间的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例不到1%，可见有很大的发展余地。他认为要促进中国与伊朗的贸易发展取决于几个关键因素。

首先是石油定价机制，中伊贸易至今以美元结算，传统的国际市场石油价格交易是美元交易。国际市场的石油价格交易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元的走势，从这个角度讲，石油出口国的出口不可能稳定。在这种情况下，中伊贸易也会受到美元上行的影响。

第二个因素是美国对伊朗制裁的程度。伊核协议签署之后，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放松了很多，因此中伊贸易就增加了很多。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后开始单边制裁，主要的制裁方式是金融制裁，而伊朗特别需要美元，因此对伊朗造成了很大的不利影响。

第三个因素是中东地区的局势，中国与伊朗的双边贸易取决于中东地区局势紧张与否，因为如果地区局势不稳，

一些国家会给中国施加很多的压力，进而影响中伊的双边贸易，特别是与以色列的关系。因此尽管中国有意大幅度发展与伊朗的双边贸易，但是可能性非常小。影响中伊双边贸易的因素不是中国能够决定的。

丁一凡认为在中伊双边贸易中，中国方面也存在很多问题。如中国商品的质量与中国形象的问题。跟许多人想象的不同，中国在伊朗的形象很差，中国商品在伊朗被称为破烂货。在伊朗，形象最好的是德国、欧洲等地的产品，这是一个急需在国家层面改善的问题。

他强调，如果中国商品在伊朗一直是破烂货的形象，那么中国想大规模进入伊朗市场是不可能的，伊朗宁可接受欧洲的投资，也不会接受中国的投资。中国在伊朗的这种不良形象是很多不法商人造成的，但是政府并没有将这个问题与国家形象联系起来加以解决。

丁一凡提到有关支付手段多样化的问题，中国与伊朗谈了很多但实际上并未落实，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事情。上海出现了人民币定价的原油期货定价市场，其发展迅速，很多阿拉伯国家也参与了，伊朗的参与度未知，但是他认为中国需要鼓励这些国家参与，通过鼓励参与中国市场来规避金融制裁问题。所以如果这些产油国更多参与中国的石油市场，会使得石油美元这件事变得更加复杂，需要更多像伊朗这样的国家参与，如果不更多的参与，对双方都不好。丁一凡认为中国需要更多的国际玩家，包括原油期货的购买者和提供者，以使市场逐渐的活起来，冲淡美元和石油之间的关系。

最后丁一凡谈了一些他的结论性看法：

首先特朗普上台之后的手段，让中国再次意识到：实际上贸易就是外交战略手段，但是中国的政府官员一般认

为贸易政策就是贸易政策，跟政治分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人不承认这个事实，于是不得不在国际斗争中被动接招。如果中国不积极使用贸易手段作为不干涉内政的替代品，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很难有所作为。

丁一凡强调，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市场，比如特朗普对中国的贸易战，美国国内会有很多人反对，实施不起来。美国欧洲日本跟中国的关系非常复杂，但是都离不开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是最大的市场。发展中国家也离不开中国，中国现在是唯一有能力对这些国家做技术投资的国家。因此中国一定要认识到自己的实力，这是一个认识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很难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

在伊朗问题上，丁一凡认为中俄和伊朗之间应该达成更多的合作。中俄伊的合作可以平衡这个区域。当然这会遇到的一个最大挑战就是美国的单方面制裁，美国的单方面制裁会造成一些中国企业受损，但是也不能因此就无限地自我反省。前一段很多人在谈中兴问题，中兴问题之前就有了，而且那个问题没有什么问题，中兴没什么错，不过就是触犯了美国的规则，惹了美国。丁一凡认为美国是对多边贸易体制的一种破坏，不会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美国对中国打贸易战，反使欧洲和日本对中国的态度有所改善，它们不敢跟美国叫板，它们没有这个能力，实际上非常羡慕中国的这个能力。

丁一凡强调，中国前一段的外交政策是韬光养晦，当缩头乌龟，其实是有问题的，这个世界需要有人去主持正义。毛泽东那个时代尚且可以主持正义，现在中国有这个力量为什么不出面支持正义，如果不这样会被别人看不起，会被美国人欺负，美国会无限地提要求，永远也满足不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中国需要顶得住，会得到别人的支持。中国如果顶住了，会发现有很多国家愿意和中国交朋友。因为别的国家认识到中国的力量，知道美国不敢动中国，那时候将会在国际关系中产生很大的效果。

第三个发言的是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吴大辉教授，他发言的主题是“叙利亚危机背景下的俄罗斯对伊朗政策。”

吴大辉提到，美国人认为伊朗最可靠的盟友是俄罗斯，但是俄罗斯人并不这样认为。在3月1号，普京国情咨文中触及了对盟友的话题，有一段表达为：“敌人如果对我和对我的盟友动武，俄罗斯将采取一切手段（包括核手段）反击。后来普什科夫解释说俄罗斯的盟友仅限于 CSTO 集体条约组织的成员协议国家——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其他的不是盟友。伊朗国内反应强烈，伊朗这么多年来一直以为和俄罗斯是盟友。吴大辉认为俄罗斯和伊朗应该是现实中的特殊安全伙伴关系，特殊的安全伙伴，它的合作是世俗性的合作，没有制度的约束，也没有条约法律的义务，而契约性的就相反。在叙利亚反恐问题上，没有伊朗的存在，巴沙尔撑不到今天。伊朗在叙利亚的地面力量有数万，阵亡人数超过3000，按照现在战争的伤亡比例算，伊朗军队超过了三万人。圣城旅的苏莱曼尼在每次重大事情前总会访问莫斯科，所以伊朗和俄国在反恐问题上的合作决定了巴沙尔的命运。吴大辉认为俄伊两国在叙利亚起的作用是五五开，但是双方在叙利亚反恐问题上的分歧可能也是未来的一个爆发点：到底是靠武力解放全境还是打得差不多就谈判，未来的政府应不应该包含反对派。伊朗方面和巴萨尔的政府没有任何的分歧，不放下武器的都是恐怖分子，它们希望解放全境。俄罗斯认为再打下去西方国家和海合会国家会干预，所以不希望一直打下去，打到一定程度就应该坐下来谈判。虽然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主导了阿斯塔纳进程，但是在成立叙利亚制宪委员会的问题上，跟俄罗斯的分歧还是相当大的。

吴大辉认为俄伊之间的另一个分歧是叙利亚能否成为进攻以色列的前哨阵地。伊朗人在叙利亚的部署超过了反

恐需求，建立了 14 个军事基地，70 多个军事目标，除了地面力量的部署，还建立了导弹基地、无人机基地，显然将目标对准了以色列，这是俄罗斯不愿看到的。

吴大辉强调，在反恐问题上俄伊合作，俄罗斯方面认为是技术安全合作的一个转机，俄罗斯希望伊朗核协议解禁之后，伊朗能够大规模采购其军事装备，另外伊朗在阿富汗西部的影响力也很大，希望双方共同解决阿富汗问题。在阿富汗问题上，俄罗斯曾推行一个莫斯科安全会议，但是美国不参加，本来是莫斯科 - 阿富汗安全会议，现在变成了在喀布尔召开，就是不希望俄罗斯在阿富汗问题上过多参与，但是伊朗是支持俄罗斯搞这个会议的，所以在阿富汗问题上，双方也是一种特殊的安全合作。

吴大辉认为，伊核协议走到今天，最积极希望留住这个协议的是德国和俄罗斯，保留这个协议不仅是解决伊朗核问题，也是俄罗斯和欧洲大国协调的平台，没有这个协议就少了一个平台。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和整个西方的关系走到了冰点，有这个交流的平台也是一个纽带，在伊核协议上，俄罗斯和法德建立了密切的协调，关系升温。

吴大辉强调，俄罗斯很看重伊朗在中东的能源大国地位，双方签署了很多能源合作协议，而且俄罗斯希望和伊朗达成换油换气的协议，在油气外销中可以互换。还有一个多边的能源合作，俄罗斯想建立天然气欧佩克，伊朗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成员，中国对此态度不积极，俄罗斯抓住印度伊朗，他们认为伊朗不参加，这项计划就很难实行。俄罗斯正在联合印度伊朗和哈萨克、土库曼等国家，希望打造天然气欧佩克，已经开始一点点启动。

吴大辉强调，这些情况让伊朗和俄罗斯关系非常特殊，双方像盟友但是存在很多分歧，包括俄罗斯使用哈马丹的军事基地，本来双方签署了秘密协议，俄罗斯为了显示和

伊朗的紧密关系公布了这些协议，伊朗很生气，没有续签。伊朗和俄罗斯因为叙利亚问题抱成团，但是俄罗斯反对伊朗在叙利亚的壮大尤其是将叙利亚作为攻击以色列的前哨阵地，但是这种反对还是不公开的。随着形势的发展，未来双方在叙利亚的合作还会进一步加强，伊核协议由于俄罗斯的坚持以及欧洲国家的协调会勉强维持下去。但是如果叙利亚的战后重建、在针对以色列的态度上双方不能有效协调，会影响两国在叙利亚的整个反恐合作。

第四个发言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院长程彤教授，他发言的主题是“伊朗国内社会热点问题之分析。”

程彤认为，伊朗的自然资源问题主要是水资源问题，伊朗连年干旱，造成现在地下水资源据说已用完一半，情况继续恶化，水安全已经上升到了战略高度，几年之后伊朗水资源将会更加严峻，更严重的是会影响到粮食安全。伊朗称粮食一直在自给，伊朗政府重视农业生产，这样下去可能是不可逆转的态势。

另一个问题是伊朗的人口问题，程彤强调前期由于两伊战争的影响和伊斯兰思想观念的影响，政府鼓励大家多生孩子。伊朗现在人口超过了 8000 万。人口的增长要和经济发展相匹配，否则会产生一系列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伊朗农村人口的城市化，由于生活条件和水资源的恶化，伊朗现在一半的村庄被抛弃。农村空心化，老龄化问题相继出现。城市由于经济低迷，也不能大量吸收劳动力，造成了城市的贫民窟，不安定因素会越来越明显。

(2) 内贾德时期为了延缓失业问题，造成了伊朗高校的大扩张，每年有 400 万毕业生，新进入伊朗市场的就业

人口是 100 万，但是政府只能解决 60 万左右的岗位，大学生加入了失业队伍。

(3) 人口未来十年老龄化。原来以为伊朗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但 30 岁到 65 岁人口占 40%，意味着十年后伊朗会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还没完全利用就马上消失了。

最后程彤总结说，伊朗现在面临的问题，一是人口问题和水资源问题，二是外部危机，金融和军事方面受到压力，以及内部权利的斗争和撕裂。虽然表面上讲伊朗是中东强国，但那是由于周边的衰落而“被强大”的。三是伊朗的合法政权依靠底层的老百姓，随着农村的空心化和到了城市以后贫民化，他们会感到毛拉们是靠不住的，底层的老百姓会越来越清晰地看到既得利益者是谁，头脑也会更清楚。反过来这也是对伊朗政权的一个威胁。程彤强调伊朗的优势是潜在的市场和一带一路的优越地理位置，中国需要伊朗稳定，而美国希望伊朗在可控范围内的混乱，这对美国的全球战略有利。程彤预判，伊朗的混乱和特朗普搅乱中东局势只是一个开始，三到五年内会有一个决定性变化。支撑点就是：自然资源问题，水资源可治理期是两年，以及哈梅内伊的健康问题。另外沙特老国王也 80 多岁，等到老国王死了之后新国王上位，沙特也会乱。整个中东地区就是一个老人政治，三到五年之后普京也老了，以色列也是老人政治。特朗普也是一个问题。至于如何应对，现在没有很好的办法，中国只能尽可能维持伊朗的稳定。

第五个发言的是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时光副教授，他发言的主题是“有限的反击——小议特朗普退核后伊朗外交内政新政策。”

时光认为，美国退核问题在美国内部争议比较大，尤其是民主党人士，特朗普退核就美国而言是不完全情愿的，而是伊朗在中东地区做大的结果。之前美国对此采取了措施，但是没有达到想象中的效果。伊朗如果不遵守相关协议，美国会实施一种快速反应的手段，对伊朗进行制裁。

时光强调，伊朗对特朗普退核早有准备，特朗普就任之后，伊朗对特朗普就没有好感，特朗普发表了很多对伊朗不友好的言论，相比较，奥巴马对伊朗较为缓和。从一开始伊朗就认为特朗普会给伊朗带来麻烦。马克龙近期访问了美国，力图劝阻美国放弃退核计划，要点是：留给欧洲维持伊核协议的时间不多。美国退出由美国主导的伊核协议是自取其辱。之后马克龙在北京和莫斯科的访问很简短，重点还是在欧洲，马克龙发表了一个声明，其要点是：全面执行安理会 2231 号决议，认为这是核不扩散体系的关键因素，对美国退出核协议表示遗憾，双方承诺在以下问题上展开讨论，希望在未来达成可行性研究方案：继续销售伊朗的石油、天然气，与伊朗展开有效的银行业务，继续开展海陆空运输业务，确保在欧盟国家金融保险行业提供支持，促进金融合作并提供支持，在伊朗进行更多的投资，支持欧盟活动并保护伊朗法律互惠的环节。

时光认为，近年来伊朗在中东地区做大导致了美国以及以色列的担忧，伊朗可能把叙利亚作为和以色列之间正面交锋的平台。经过了好几年采取其他方式无果的情况下，美国退出了伊核协议。伊朗的参战武装人员在叙利亚已经大大减少，主要是提供民事和军用物资援助，伊朗已经撤离了大部分前线作战人员。此次伊朗否认直接向戈兰高地发射火箭，这次打击不是直接打向戈兰高地，还是比较有保留的。4 月 14 号美国和盟国公布了在叙利亚打击情况。在叙利亚问题上，伊朗会继续保持存在，但是不会主动挑衅。

时光强调，巴勒斯坦问题在叙利亚问题的背景下淡化，

以前伊朗是支持哈马斯的，伊朗在这段时期疏远了和哈马斯的联系，现在涉及使馆迁址问题，最近几天也没有发表过分的言论，暗示与沙特和以色列的交好，从斋月的开始到结束，伊朗不会有太大的支持巴勒斯坦的活动。

时光认为，应对美国经济战是伊朗的主要任务。2015年以来伊核协议达成后，伊朗将经济问题作为政府的主要工作目标。第二个重要任务是保持政体的稳定，应对中东敌国反政府势力的施压。其实，局势被媒体热炒，70%以上的或真或假的消息来自中东地区的两个大国，美国推翻伊朗现政府为什么没有效果，因为他们没有可靠的或者影响力的代理人。

另外，时光认为，伊朗虽然是一个多民族宗教国家，但是以什叶派为主，可能不具备中东其他国家存在的引发内部冲突的因素。在伊朗西南部少数地区有小规模骚乱，但是在受控范围内。有反恐问题，伊朗国家安全部门应该会保持警惕。

最后时光对发言内容进行了总结，他认为伊核协议夭折是伊朗无法接受的，毕竟谈了十几年，但是现阶段恢复经济是伊朗政府的重点。特朗普退核标志着在其任内美伊关系将无法好转。两国与相关国家的动态也必然影响伊朗国内稳定，以及地区性、全球性发展问题的走向，

随后，与会的专家学者就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讨论环节由吴冰冰副教授主持。

吴：前一阵，美国因中兴向伊朗出售产品对中兴施加制裁，我们是否可以讨论一下这件事。另外，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后，美国的制裁会对中伊之间的经贸和金融往来产生什么影响？从美国的角度讲，伊朗现在将欧洲作为维持协议的重点，希望欧洲在美国退出后能保留经济上的好处，如果欧洲保留了，特朗普就白退出了。所以美国会对欧洲施加巨大的压力。很多美国专家的判断是欧洲不可能顶住美国的压力。如果欧洲承受不住压力，那么中国怎么应对美国的压力？

第二个问题，关于能源和金融合作如何进行？欧洲表示，要和伊朗进行一种特殊的金融安排，交易中绕开美元，欧洲要建立一个和美国没有往来、只和伊朗交易的金融机构。但这种安排能否成功？今天有消息说，伊朗已经和中国签订了第一单以人民币结算的石油合同，所以上海石油期货交易所的开张恰逢其时。在伊朗和中国用人民币结算的情况下，伊朗可能会要求其它国家在和它交易的时候也用人民币结算。如果这样的话，中国就会成为美国制裁首当其冲的目标。

还有一个问题，关于伊朗和以色列在叙利亚的军事对抗。伊朗想把叙作为军事冲突的发起点，但俄罗斯不愿意。更加扑朔迷离的是，关于叙利亚有各种假消息。至今为止，以色列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朗目标已经发动了40多次的袭击。伊朗一直保持克制。直到美国退出协议，伊才向戈兰高地发射了火箭弹。而戈兰高地还不是以色列领土。所以伊朗选择目标还是很精准的。以色列的底线是它的领土不能受到攻击。此外，这次火箭弹攻击还证明以色列的“铁穹”系统拦截能力有限。

丁：其实中兴问题不是新问题，只是美国翻老账，她害怕中国的 5G 技术发展，美国想借此搞垮中兴。但它大大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低估了别人的实力。FT 有一个报道，如果美国制裁中兴，第一年中兴的业绩会下降 38%，第二年下降 18%，第三年则没有影响。美国不对中兴出口芯片，中兴就会寻找替代来源，而中国芯片市场占全球份额的 58%。所以真正应该担心的是美国的企业，因为三年以后这些企业可能面临倒闭。另外，大家大大高估了芯片的技术含量，中国并非造不了。华为、中兴之所以要大量进口芯片，是因为成本的原因。世界上需要芯片的只有这几家企业，所以芯片制造商会有成本核算，像高通这样的大型厂商都是在实现了市场垄断后才有能力有钱开发一些比较冷门的技术，不是因为技术难，而是因为不核算。只要中国领导人下定决心，不让这些技术受制于人，一下子就能搞出来。就看政府愿不愿意补贴这些芯片企业，因为如果政府不补贴，企业搞芯片是要亏本的。所以芯片其实不是很大的问题，很多研究贸易战的人不懂技术。最近有 1100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联名向特朗普写信，抗议特朗普向中国发动贸易战。这其中有 4、5 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4、5 个前美国政府经济顾问。特朗普这次之所以让姆钦带队到中国谈判，就是因为姆钦主张贸易战要适可而止，而内瓦尔罗等人是比较强硬的，他们之间有分歧，这是美国内部的事。我认为贸易战会不了了之，因为如果他坚持要搞下去，最后的结果很可能就是杀敌 800，自损 1000。

在未来的欧洲、伊朗和中国的三边贸易关系中间，欧盟能不能挺住美国施加的巨大压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贸易战结果如何，如果中美贸易战根本没有结果，欧盟就不会由着美国来。只要中国能挺住，欧盟就会跟着中国玩。所以中美贸易战的结果会影响整个世界局势的发展。欧洲人非常恨美国的单边主义，因为欧洲人只能靠周边的贸易体系来维持所谓的国际秩序的公正，而国际秩序的公正性被美国的单边主义破坏了。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中国人总

是考虑利害关系，我们不太重视原则问题。但欧洲人重视原则，所以如果中国能挺住，欧洲就不会向美国妥协。事态发展一定会取决于中美贸易谈判，虽然美国给了欧洲人很多时间，但是六月份就是美国人给中国下的最后通牒，如果中美贸易战结束了，欧洲一定不会跟着美国人。事情的关键在于交易货币。货币是交易的核心，而货币交易的问题很可能对人民币的国际化是一个机会。因为欧盟要跟伊朗做交易，当然欧元是最主要的交易工具，但是问题在于伊朗不会有足够的欧元进行各种交易，所以我们可以建议欧盟和伊朗的交易除了使用欧元之外还使用人民币，这应该是欧洲人可以接受的。因为伊朗的货币是一个不稳定的货币，从最近的表现就可以看出来，所以靠这种货币进行交换，对于欧盟来说是不放心的。历史上从来都是如此，过去我们人民币不是一个稳定的货币，我们和欧洲的贸易使用欧洲共同体的货币，加上美元。欧盟成立了以后用的是欧元加上美元。但是从 2010 年美国单边惩罚了法国和德国的两大银行以后，欧盟到现在为止全部采用欧元加人民币，过去用美元结算的贸易现在全部使用人民币，人民币代替美元成为中欧贸易中的一大货币，所以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量就变成了第三大货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中欧贸易中使用了人民币。我们跟伊朗使用人民币交往，伊朗有很多人民币，所以欧盟可以提出和伊朗的交易除了欧元还使用人民币。这样的话反过来也会推进中国和伊朗的贸易，中国在伊朗的投资就可以使用人民币，这样可以增加伊朗的人民币收益，伊朗有人民币收益就可以更多与欧盟做国际贸易，这样形成了一个新的三角关系，应该对除了美国之外的各方都是有利的。这样就可以避开美国的威胁，进一步削弱美元在中东的影响力。

钱：我想提一个问题，如果说现在伊朗的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经济不发展这些问题都很严重，跟巴列维政权

晚期差不多，那么伊朗的伊斯兰政体和巴列维政体相比，这个政权还有存在的合理性吗？我认为这可能是我们理解伊朗这个国家的关键。

陆：我引用华大使的话，他认为现在的情况其实比巴列维晚期更糟糕。伊朗国内现在也有反思：这个政权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伊斯兰革命初期，最受益的是社会最底层民众，他们得到了土地和补助，这很重要，因为伊斯兰共和国是靠对底层民众的补助维持其合法性的。革命之后一批底层的人上升了，进入政府或发财了。但是他们的子女，引用华大使的话，现在比谁都腐败。议会烧国旗事件发生后，网络上跟帖，那些烧国旗的人的孩子都在西方生活。所以一部分人上升，一部分人发财，一部分人还在社会底层，这是最初的获利阶层。但是现在社会底层的人比过去更苦了。伊朗的中产阶级告诉我，受制裁影响最大的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资产大幅缩水，上层人士可以靠走私，但是底层生活更困难，因为没有钱补贴了。

钱：那么反过来问，推翻巴列维政权对伊朗的国家发展到底好不好？

田文林：当年巴勒维王朝的覆灭是很多问题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在刚搞白色革命的时候，民众从上到下都是支持的，但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贫富分化，过度的西方化，外交上的亲美诸如此类的一系列问题，都会让伊朗人难以承受。他们最终选择伊斯兰道路也有一定的偶然性，推翻王朝的有世俗小资产阶级，也包括伊斯兰势力。但在政权

倒台以后，所谓世俗的小资产阶级与宗教势力之间有竞争，宗教势力的组织性可能更强，在策略上应用更好，把主张走世俗化道路的力量都排挤掉了，包括现在在国外的反对派组织，伊朗伊斯兰圣战组织，过去都是左翼的组织，现在都被排挤掉了，最后走了这么一条路，所以这条道路具有一定的偶然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伊朗现行的政权，与阿拉伯世界的其他政权相比，是政教合一的政体，不是我们想象的仿佛很落后的政体，它有适合伊朗国情的一面。以埃及为例，埃及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和政权权力本身是相互割裂的，穆兄会这样的宗教势力掌握着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他们有一套政治哲学理论。而赛西和过去的穆巴拉克在这方面处于失语状态，埃及为什么走这条路？理论制的高点是什么？答案是没有的，因此穆兄会这样的组织就可以经常批评世俗政权，让世俗政权总觉得必须使用强力镇压的手段。而在伊朗，这个问题是解决了，她的道统和法统是合一的。所以伊朗的政权会比埃及的政权稳定。我认为这是她体制上的可取之处，避免了不必要的内耗。第三点，有人说伊朗现在出现很多问题是当权者忘记了初心。他们过去反抗是因为贪腐的权贵统治出现了很多问题，这个政权带有很强的平民主义色彩，强调公平分配，它设立了很多金融政策都是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但是经过三四十年的发展，伊朗过去的教士阶层实际已经高度权威化了，伊朗革命卫队也变成了既得利益集团，无论是内贾德还是鲁哈尼都动不了这个集团的利益。他们不是在促进经济发展，但是也没有解决办法。从经济政策上来说，内贾德的政策带有很强的民粹主义色彩，把石油的收入放在民众家的餐桌上，实际是一种分配领域中的公平，并没有解决生产问题。分配石油货币造成了更大的通货膨胀，把早年的发展资金消耗掉了，所以带有很强的民粹主义色彩的分配政策是有问题的。鲁哈尼的政策和哈塔米、拉夫桑贾尼的政策是一致的，要推动私有化来解决问题，但是这种改革的受益者仍是那些“掌勺者”，再加上外国的制裁，伊朗现在出现了很多问题。

程：伊朗制度本身是有合理性的，因为经过一百年的发展，伊朗尝试过全盘西化，也尝试过社会主义道路，有地方性的苏维埃政权，但是都失败了。最后采取伊斯兰共和制度成功了，这是对历史的总结，从历史合法性的角度来论证它的合理性。伊斯兰共和体制是伊朗真正的（至少在政治上的）独立，不要西方资本主义，也不要东方社会主义，只要伊斯兰共和。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自主，这一点是伊朗所自豪的，又符合伊朗的地区大国复兴思想。但是伊朗又逃不出历史的传承性，在伊朗的历史发展框架中有两个权力，一个是王权，一个是教权。王权随着社会发展是逐渐被淘汰的，教权把王权打掉了。教权有历史渊源，印欧人进入伊朗之后就有一个固定的教士阶层，掌握着思想意识形态的职权。国王必须维护他们在思想意识形态上的独立性，因为伊朗地处东西两方之间，它永远处在争斗和战争的状态，而且不断有外来民族进入这个地区，所以伊朗是阶层、种族分化特别明显的一个社会，只能靠意识形态来维持。意识形态的维护者就是教士，教士阶层倒了，伊朗就会面临可怕的后果，伊朗人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再说内部割裂的问题。一方面是怀有纯朴伊斯兰革命理想的百姓拼命维护这个政权，一方面有中产阶级西化的这群人，有历史上的贵族家族利益集团。当年，像霍梅尼这样的宗教贵族集团发动了底层群众，按照当时的人口比例，大多数的年轻人来自农村，白色革命后开始城市化，引起城市贫民的暴动和反弹。现在不同了，伊斯兰革命在实践中进入了困境，农村的新鲜血液现在越来越少了，并产生了新的既得利益者，原来与人民打成一片的人，现在也贵族化了。所以伊斯兰政体的合法性越来越受到质疑。当时领导伊斯兰革命的人现在年纪也大了，会产生老人政治。在伊朗也没有能够继承伊斯兰体制的第二代精英。比如哈梅内伊的孙子，现在终于当毛拉了，但是按说早就应该当毛拉了。这跟中国的体制相比，就会看出我们的体制一直在注入新鲜的血液，而他们的第二代就不在政治体制中存在于。伊朗的教士阶层是有固定的阶级界限的，内部通婚，

一个家族的教职头衔（比如祭司）是传几十代的。实际上伊朗是另一种种姓制。这种性质在社会范围上的影响，现在还存在。现在毛拉的儿子都去经商了，没有第二代了。

吴：我认为这样对伊朗的评价过于负面了。

程：我也在反思，为什么伊朗的制度能够延续下去，她的教育制度有积极的一面。每年毕业很多大学生，并且来自各个阶层，这能够保证在各个领域有精英的团队，为国家体制、职业官僚形成固定的新鲜血液的队伍。

吴：初期我研究阿拉伯问题的时候，总是想从部落制来分析阿拉伯社会。那么为什么存在两千年的部落制到了今天还是分析的依据呢，变化和现代化进程在哪里呢？难道这个社会是一个僵化不动的社会吗？这其实就是东方主义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现在伊朗的体制和以前不一样的有这几点：第一就是他在中东地区建构了一个具有独立性的意识形态，就是伊斯兰主义包裹下的民族主义。五十，六十，七十年代和左翼相贴近的民族主义到八十，九十，二十一世纪成了在伊斯兰主义包裹下的民族主义，不是民族主义失败了，而是它和左翼思想渐渐脱钩，以后和伊斯兰主义结合了。所以它有强烈的伊朗民族的自豪感。伊拉克、黎巴嫩也在渐渐地走上这条民族主义路线。沙特阿拉伯也在建构沙特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相结合。民族主义是变化了，而不是被伊斯兰主义击败了，这是重要的现象，而它是由伊朗开创的。第二个就是她的政治体制，伊斯兰共和制是一个共和体制，但是要体现伊

斯兰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所以才出现了两套系统，选举的和非选举的。结合的结果就是对民意有所回应，因为不管怎么说，鲁哈尼的内政外交政策和内贾德是完全不一样的，不能否认变化是很大的。内贾德内政中奉行的是民粹主义的经济政策，而鲁哈尼是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有人觉得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离开了自由化的政治和社会政策是不能够存在的，伊朗在探索到底能不能存在。这种制度在中东伊斯兰世界是独一无二的，除了以色列和伊朗，其他的国家的效果都不太好。所以稳定的伊斯兰共和制的政治体制是一个独创。第三，我认为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是一个次国家行为体（sub-state actor），它实际上是中央政权和民众之间利益的纽带，而不是削弱中央政权的机制。它通过民兵组织把大量的底层民众动员起来支持政府。当然它拥有巨量的资源，他把伊朗民众调动起来了。后来的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人民动员军，胡塞武装和 Hamas 其实都在学习它，现在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也在学习。在这个体制下，它能够保证国内安全和动员，效果是独特的，沙特就没有。第四是地区安全，通过什叶派的情感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动员，它在国家的内政中建立了新的政治组织，从地区安全讲，其他中东国家都做不到。阿联酋向伊朗学习，在也门搞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学伊朗的做法很有效，所以阿联酋对也门南部的控制远远超过其他国家。最后一点，我认为要看到什叶派形成的独特的宗教机制在伊朗体制下的作用。它的等级制是人为地建立了一个从上到下治理社会的机制，要想在什叶派内部搞一个从下到上的颠覆性的运动是很难的。穆兄会也做不到这一点，穆兄会从上到下的等级制度不稳固。而什叶派的宗教体制是围绕着什叶派的宗教传统和宗教教育从上到下地稳固下来，是一个社会系统，带动了整个社会的稳定。而这些因素应该是在当前状态下演变出来的新因素，我认为这些因素是伊朗稳固的原因。刚刚大家说的负面的因素也存在。正是因为正面的因素超过了负面的因素，才会看到伊朗在整个地区状态比较好。比较中东其他国家，就会看到伊朗的制度在中东地区是大家想学的样板，而不是摒弃的对象。

钱：刚刚你说的这些是不是一百多年前伊斯兰现代派的理想的兑现？阿富汗尼等人的思想。

吴：RGC 作为次国家行为体的机制，是穆兄会最早开创的，但是穆兄会从来没有成功过，这也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也不能说是靠阿富汗尼的影响，阿富汗尼的思想出来以后，建立组织还是靠哈桑·班纳建立的穆兄会。霍梅尼从穆兄会，从巴基斯坦的伊斯兰促进会学到了这些东西之后，在伊朗就成功了，但是他学的对象都没有成功。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分析这个问题呢。这类伊斯兰组织有三个功能：社会服务，政治参与和军事斗争。为什么他成功了，其他的没有成功？

程：关于伊斯兰革命卫队我再补充一下。我认为这有历史传统。伊朗这个国家历史上从来就有两支军队。阿契美尼德王朝能征战世界就是因为有不死军。他有两套军队，一个是国防近卫军，一个是地方武装。他的精锐部队是不死军，可以到处征战。另一个历史顶点就是萨法维王朝，在开始和奥斯曼王朝打仗的时候处于劣势，到阿巴斯时期，他把格鲁吉亚的奴隶兵和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结合起来，形成了伊斯兰时期又一个鼎盛的王朝。霍梅尼有很多正面的因素，但还是根植于伊朗的历史传统，就是必须要有军队。通过军队来动员人民这是他的核心，只要顶层的毛拉和伊斯兰革命卫队这条线不断，军队掌握在手里，伊朗体制就可以维护住。我也曾经问过国防军怎样？国防军其实是有二心的，因为它在被留用的前朝的军队。在爱国主义问题上没有问题，但是在维护伊斯兰体制的问题上是有问题的。伊斯兰政权采取了更换人员的方法，用原来革命卫队的高级将领换下国防军的高级将领。另外在和周边的冲突中，

在派出军事顾问这方面，伊朗军队一直有作战经验。所以，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现政权都是稳固的。要看伊朗今后如何发展，就要看它如何管理这支军队。

吴：中东国家历史上普遍有两支军队。伊拉克、叙利亚除了有军队，还有共和国卫队，沙特阿拉伯除了军队之外有国民卫队。两支军队制衡的传统在中东是普遍的。（是不是游牧部落有这样的传统？）游牧部落不可能建立这样的机制，一支军队就把他们拖垮了。伊朗在公元前七世纪就有两支军队了，其中一支是近卫军（包括阿拉伯国家的共和国卫队），是专门保护君主的，这支军队是和人民对立的，不是和人民对接的工具。奴隶军在阿拉伯世界叫马穆鲁克，马穆鲁克最大的特点就是来自境外，格鲁吉亚、突厥、蒙古、亚美尼亚、波斯尼亚等等，跟这个社会没有任何关系。因为跟社会没有关系，所以更彻底地为君主服务。今天的巴林，大量引进巴基斯坦的雇佣军，用巴基斯坦人才能镇压本国人。所以巴基斯坦的俾路支人大量进入阿拉伯国家，就是做这个工作。革命卫队的最大区别是不为君主服务，而是政权和底层民众对接的通道。它深入到社会内部，所以才能在黎巴嫩支持真主党。真主党是黎巴嫩人内生的一个机制，而不是外来的，是什叶派的代表。没有伊朗，真主党也会出现，只不过不强，所以它要提供社会服务。革命卫队是一个次国家行为体，当掌握大量资源的时候就会产生精英，但是起到了动员和巩固政权的作用，这是和古代体制的最大区别。按照这个模式，真主党在黎巴嫩，人民动员军在伊拉克，胡塞武装在也门，谁能够成功动员底层民众，谁就成为一个次国家行为体，在这个国家里面就是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所以它必须提供社会服务。穆兄会也是这样，并且做得很好，但就是不成功。两支军队平行的状态在古代和现代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我同意刚才所说，它保卫这个政权比军队有效。从 1979 年算起，

到现在已经四十年了，如果在这么长时间里伊朗还不能改造一支军队，那就太失败了。所以现在军队和革命卫队对政府的效忠程度差不多，只不过伊朗有分工。核项目和导弹项目在革命卫队，正常的军事作战能力在军队，特种作战在军队，国内防卫在革命卫队。（这个分工在伊朗宪法里说的很清楚）陆海空三军是军队的，革命卫队是三军的省级指挥部，负责国内维护，但是核和导弹项目交给革命卫队，所以它才有大量的基础建设能力，因为它要从基础建设赚钱来养导弹和核项目，军队是不能提供的，因为军队不能搞基础建设。

吴大辉：刚刚我从以色列的国防部网站上找了一个数据， Hamas 在过去的六年间发射了 737 枚火箭弹，铁穹拦截了 245 枚。我算了一下拦截率是 33.2%。但它是有选择拦截的，因为拦截的成本太高，一枚要 3.6 万美元。测位雷达可以算出导弹打向何方，戈兰高地大量地方是没人居住的，所以这 737 枚火箭弹没有造成太大伤亡。伊朗发射的是 bm27 冰雹火箭弹，四十枚一次性发射，它不是可控的，不是一个弹炮综合体，发出去之后只打向一个目标。所以测位雷达会很快测出弹着点在哪里。如果测出的弹着点不在居民区，就可能不使用昂贵的拦截导弹。在以色列本土建立了全境的拦截体系，而对于戈兰高地等山区，并不是不能拦截，而是有选择地拦截。另外我在五一期间和一些俄罗斯人聊起特朗普退出伊核协议的话题，他们认为俄罗斯早就有预见，如果伊朗在叙利亚的行动不收敛，就会在核协议问题上出问题。所以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应该是适度的，军事行为应该有所收敛。伊朗对以色列的反击是很有限的，这可能与俄罗斯参与其中有关。俄罗斯一直希望伊朗削减在叙利亚的军事力量，反恐结束之后就撤走，包括两万人的哈扎拉人武装力量。俄罗斯建议可以部署无人机，但是不应该部署导弹部队。伊朗方面并不听俄罗斯

的劝告，所以普京办公厅的人就说，他们已经预见到特朗普要退出，而美国也希望俄罗斯能够做伊朗的工作。退出核协议，除了伊朗研发导弹和对伊朗核武发展限制不足这些原因之外，更直接的因素可能是伊朗在叙利亚的行动不受节制。

“博雅工作坊”第六工作间

伊朗：国际、地区和内部视角（下）

2018年5月17日下午

“伊朗：国际，地区和内部视角”下午的工作坊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吴冰冰主持。首先发言的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金良祥。他的发言主题是“地区大国群体性崛起对伊朗周边政策的影响”。他在发言中从地区视角探讨了伊朗问题。

金老师认为，很多人讲中东地区的两极化结构，冷战化趋势，其中一个预设的前提是美俄在中东地区的博弈。金老师不完全同意这一看法，他认为中东地区力量结构是单极结构，冷战结束以后，以海湾战争为标志，美国确立了其在中东的战略秩序。而这个单极秩序现在面临着很大的危机，危机开始于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再往前则是阿富汗战争。这两场战争标志着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单极秩序进入充满危机的阶段。地区大国原来的影响力较小，如伊朗，沙特等，而美国单极秩序的危机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收缩留下了很大的权力真空。金老师认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收缩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美国收缩是其全球战略调整的需要。特别是奥巴马政府时期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要把更多的战略资源投入到亚太地区。第二，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消耗了美国大量的战略资源，特朗普也抱怨美国在中东地区花费了大量金钱，划不来。第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打击了美国介入中东地区的意志。金老师说，他有一年在美国夏威夷碰到一个美国老兵，全身伤痕，十分厌恶伊拉克战争。金老师认为这两场战争打击了美国介入的意志。奥巴马时期，美国的中东战略是收缩，而现在的特朗

普政府其实也在收缩。收缩以后，中东地区形成空间，这个空间由谁来填补？2013年讨论最多的是中国会不会填补这一空间，对中国介入中东的可能性美国很矛盾。一方面，中国的战略资源不进入中东，美国会感觉自己亏了。另一方面，中国的战略资源进入中东，美国又会感到不安。事实上，美国在中东地区战略收缩留下的空间不是由中国填补，而是由两个力量填补，一个是俄罗斯，另外一个地区大国。

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战略仍然是收缩的，而美国的政策核心是以色列。在伊朗问题上退出伊核协议，在叙利亚问题上重新介入，特朗普访问沙特这一系列行为是从生意而不是战略角度来看问题。特朗普特别强调美国要从叙利亚撤退，不愿意再投入战略资源，而是要把资源投入到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中。俄罗斯在叙利亚的介入是防御性的，因为叙利亚对于俄罗斯在中东施加影响力具有重大的意义。俄罗斯不是经济大国，而是军事大国，叙利亚对俄罗斯进入地中海和中东地区非常重要，因此俄罗斯一定要确保阿萨德政府的稳固地位。所以在中东问题上，金老师认为美国是战略收缩，俄罗斯则是防御性战略。

金老师强调虽然地区大国面临着不同的问题，但都试图在中东地区扩大自身的影响。而地区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并不意味着地区大国实力的上升。例如伊朗存在着很多国内问题，沙特的经济实力也没有增强，但是这些地区大国对中东地区事务的影响力在增强。金老师以中东五个地区大国为例，论证中东地区大国群体性崛起。首先伊朗在伊拉克战争以后，对伊拉克的影响非常大，伊朗和沙特对叙利亚，也门和巴林都有很强的影响力。土耳其也强势介入2017年发生的沙特与卡塔尔断交危机，土耳其一直处于中东地区边缘地带，利用这次断交危机，实现了在中东腹地卡塔尔的军事存在，这对土耳其而言是重要的一步。另外土耳其在巴以问题上也十分活跃。埃及因为面临种种困难

而暂时在中东事务上保持低调，但是埃及并不甘心退出这样一个舞台。以色列原来主要被巴以问题所牵扯，但是现在以色列的角色发生了转变，从中东地区安全最大的威胁者转变为地区力量格局的塑造者，而伊朗则变为中东地区安全的最大威胁，这是以色列战略的成功之处。

在地区大国群体性崛起的背景下，大国往往被地区大国拉入中东乱局中，例如叙利亚化武危机，在三个时间段达到高潮，第一个时间段是2013年8月份，很多国家呼吁美国奥巴马政府介入叙利亚化武危机，但是奥巴马政府不愿介入，于是就制造了巴沙尔政府制造储存化学武器的事件，奥巴马政府不得不表态如果叙利亚政府对普通民众动用化学武器，美国就会干预，后来就发生了化武危机。第二个时间段是2017年4月，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尚不明朗，结果也发生了化武危机。第三个时间段是2018年4月份的化武危机，发生的背景是特朗普宣布美国要从叙利亚撤军，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化武危机再一次发生了。因此金老师认为一些力量不希望美国从中东地区撤出。同样，伊朗也不希望俄罗斯撤出中东。

最后，金老师谈到大国群体性崛起对伊朗外交政策的影响。认为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收缩既为伊朗提供了战略空间，也给伊朗增加了战略负担。伊朗是一个有地区大国抱负的国家，而地区大国崛起给伊朗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伊朗对中东事务的参与有一点不得已而为之，超过它自身的国力。伊朗在中东一方面有主动参与的部分，另一方面也到了不得不搏的地步。未来伊朗在中东将采用三种手段，第一，继续采用代理人战争方式；第二，在军事上投入更多的战略资源；第三，继续使用宗教地缘战略。大国在实现自己的战略利益时往往采用军事和经济手段，但在中东，宗教是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有的人认为中东问题是教派矛盾，金老师持相反意见，认为一些国家利用宗教身份进行地缘政治扩张。例如沙特在巴林，也门等就采用了这样的策略。

第二位发言的是来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田文林老师，他的发言主题是“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下的中东局势”。田老师首先探讨了美国对中东政治的影响，他认为在中东地区外部因素的作用要大于内生性因素的作用，而外部因素中影响最大的是美国。美国推行什么样的中东政策，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出现什么中东格局。2017年特朗普上台以后，他的外交政策很难定位，而特朗普所做的几件事都很出人意料。最近美国大使馆由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引发了轩然大波。这件事在几十年前美国就已经通过了法案，但是历任总统都没有做这件事，而特朗普做了这件事，造成了冲突，导致了巴勒斯坦人死伤惨重。另一件事是退出伊核协议，伊核协议签署以来的2年多的时间里，其他5个签约国还有美国国内的政治精英都主张保持这一协议。本来美国定在5月12日宣布是否退出伊核协议，但5月8日特朗普就宣布决定，可以看出特朗普做这件事迫不及待。特朗普推翻了奥巴马政府时期几乎所有的中东政策，奥巴马执政时期，试图改善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而特朗普上台以后，关系恶化。奥巴马政府在中东最大的政治遗产就是伊核协议，如今也被特朗普废除。奥巴马政府时期对以色列若即若离，认为与以色列靠得过近没有好处，而特朗普上台以后毫不避嫌地站到以色列一边。田老师认为这两方面原因，第一，特朗普的外交理念是美国第一，只从美国视角考虑，虽然伊核协议是多边签署的，但特朗普认为对美国不利，自然可以废除。第二，是特朗普的原则是对朋友要更好，对敌人要更狠，特朗普对奥巴马时期美国盟友对美国若即若离的态度感到不满，而美国又与敌人伊朗走的很近。所以特朗普认为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很不正常，废除伊核协议可以让美国的盟友以色列和沙特感到满意，又打击了美国的敌人伊朗。特朗普的做法是挑动中东国家之间的争斗，一边沿袭奥巴马政府的收缩战略，不加大投入，另一边制造国家之间的矛盾，从而保持离岸平衡的政策。在伊朗与反伊朗阵营之间制造对立符合美国的预期，特朗普访问沙特，因为卡塔尔发表亲伊朗言论，

所以特朗普撺掇沙特与卡塔尔断交，为了改善关系，卡塔尔和沙特均从美国购买了大量的军火，特朗普对此感到很满意。

从这一系列事件可以看出美国的中东政策很大程度上被以色列和美国的犹太游说集团所绑架，甚至可以说美国的中东政策实际上是为以色列服务的，从历史的角度看，冷战时期，美国利用以色列对抗苏联和阿拉伯民族主义，冷战后，以色列在利用美国清除其在中东的对手，这一过程是与80年代后美国华尔街金融资本对美国政府的渗透是同步的。美国的资本集团对政策的绑架从里根时代就开始了。以色列在中东的对手，萨达姆，卡扎菲以及现在的巴沙尔和伊朗，消除这些对手借助了美国的力量。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的消耗是很大的，唯一受益的是以色列，改善了以色列的地缘环境。特朗普现在也是在为以色列做事，迁馆事件对美国没有任何好处，只有以色列获益。另外美国中东政策的目标是通过制造可控的混乱从中获利，美国的经济金融化水平很高，在经济金融化的背景下，通过制造危机获得利益是一个重要方式。中东保持适度动荡，可以使油价保持一个较高的价位，就像上个世纪的两次石油危机，油价上涨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与石油挂钩之后发生的，促使很多国家储存美元购买石油，强化了美元的霸权地位。现在新兴国家崛起，美国又需要通过一定的方法恢复美元的霸权地位，在中东制造事端是保持经济霸权的很好方式。

田老师对美国退出伊核协议这一事件的影响有自己的看法，通过特朗普在中东地区推行的政策，田老师认为特朗普可能是中国的福星，是一件好事。特朗普的政策是短期获益而长期受损的，特朗普所做的事目前看起来对美国冲击不大，迁馆事件由于阿拉伯世界四分五裂，沙特有求于美国和以色列，阿拉伯世界没有什么反应。伊核事件中美国退出协议，而伊朗仍要留在协议中，美国可以对伊朗

实施制裁，而伊朗还需要遵守协议，目前来看美国占优势。但是田老师认为西方国家的政策由于受到选举制度的影响，必须要在任期中立竿见影，导致他们的行为注重短期利益，是一种注重实用主义的短期行为。特朗普作为商人出身的总统，没有长期的战略考虑，试图在每一个双边关系中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这是他的思维缺陷。田老师认为有三个方面，第一，导致美国在战略上四处出击和力量分散，在奥巴马时期美国全球战略有整体考虑，随着中国崛起，美国要集中力量对付中国，为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建立广泛的反华战线，甚至对一些与美国敌对的国家，美国也力争与他们搞好关系，比如与伊朗达成伊核协议，与古巴恢复外交，与朝鲜，缅甸搞好关系等。所有的目标只有一个，集中力量，对抗中国。而特朗普一方面发动贸易战，制裁中兴，另一方面还要制裁俄罗斯，促使俄罗斯与中国接近。退出伊核协议加深了美国与伊朗的对立。美国同时与这几大力量对立，他的力量必然会发生分散。欧洲国家与美国的关系也很糟糕。因此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比奥巴马政府的多边外交政策更糟糕。第二，伊朗的政权并没有那么脆弱，伊朗与美国对抗数十年，美国一直实施单边制裁，但没有阻止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扩大。美国的行为导致伊朗国内的亲西方派别难以在国内继续取得支持。美国对伊朗的所作所为，伊朗人是不会忘记的，导致在未来美国与伊朗之间关系的缓和可能近似于零。鲁哈尼所有的外交政策都与伊核协议相绑定，所以伊朗不可能废除伊核协议。但是伊朗未来政府必然是强势的，反美的，强调国家安全的。伊朗把安全放在第一位，重启核计划，最终走向一条与朝鲜相似的道路，这会给美国带来巨大的灾难。美国要么面对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伊朗，要么发动一场局部战争。第三，重挫了美国的国际信用、盟友体系和制度霸权。美国作为世界的霸权国，通过国际机制来推行美国的霸权利益，在获得最大利益的同时不造成强烈的反感。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牺牲了美国与盟友的关系，以制度霸权来换取眼前的利益，使美国的未来更加糟糕。这对中国不是坏事，

虽然会给中国企业在伊朗的经济活动带来困难，但是特朗普的行为类似于小布什，使美国深陷中东，陷入战争泥潭，软硬实力均严重受损。有可能给中国带来长达十年的战略机遇期。

第三位发言的是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刘英军老师，他的主题是“多元的习惯与折中的制度——伊朗案例管窥”。刘老师选择了伊朗的“女性在公共场合佩戴头巾问题”和“阿舒拉日哀悼游行的行为规范”两个问题，从小案例入手分析伊朗问题。

刘老师首先阐释了习惯与制度之间的关系，习惯是一种内生的自觉，而制度则是一种外部的约束，相对于习惯而言，制度更多是人为制定的。在第一个案例中，“女性在公共场合佩戴头巾问题”之中存在着习惯与制度之间的长时间的角力，需要先回溯历史。在伊斯兰时代这一问题并没有特别的规定和具体的规章，到了立宪革命和白色革命时期，有了制度的转向，比如巴列维王朝时期为推动现代化，国王发布政令，要求女性在公共场合不得佩戴头巾，甚至要求公职人员必须携自己的夫人不佩戴头巾出现在大街上，否则就会失去公职。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政府反其道而行之，多次颁布法令要求女性必须在公共场所佩戴头巾，外国游客也不能例外。但佩戴头巾问题在伊斯兰革命后也分为几个时期，有三个时期比较重要。首先是1979年革命领袖霍梅尼在讲话中提到女性在公共场所应该佩戴头巾，然后1983年伊斯兰议会通过伊斯兰刑法修订案，以立法形式予以明确。1996年又一次修订，明确了对违法者的惩治和量刑标准。1997年到2005年，改革派总统哈塔米当政时期，风气趋于开放。2005年到2013年，内贾德总统当政时期，文化革命最高委员会通过了纯洁文化推广计划法令，公共文化委员会随后批准了推广纯洁文化与

头巾的实施方案，把女性佩戴头巾问题落实下来。女性佩戴头巾问题长久以来充满争议，无论是在伊朗国内还是国外。2014年，在伊朗绿色革命后流亡的女权活动家阿琳娜嘉德在脸书上发起“我的秘密自由”运动，鼓励伊朗女性在公共场合悄悄揭掉头巾拍照并上社交网络，推动女性着装自主权。西方媒体以及我国一些媒体一边倒支持这一运动，2014年5月新华社驻伊朗前记者在新华网上发文，伊朗社会开放与保守之争从来没有停歇，涉及悠久的历史，文化，宗教，地域，阶层等，是一个复杂问题，不能简单下判断。在当时的伊朗也有支持女性佩戴头巾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当前的伊朗试图强化伊斯兰规范，但在制度执行力度上并非一成不变，女性在伊朗戴头巾存在多维差异，在德黑兰一个城市的北城和南城场景也是完全不同的。历史上，巴列维王朝，哈塔米，内贾德，鲁哈尼时期也是各有不同的现象。强制佩戴头巾制度的执行力度反应伊朗国家路线方针的走向，在伊朗也有不同的执行手段，如道德警察和经济手段等，但是执行力度是不同的，执行力度是对伊朗政策方针调整的反应。

第二个案例是阿舒拉日的游行案例。这个问题关乎伊朗文化的重要内核，不但历史悠久而且在伊朗是全民参与。伊朗是以什叶派为国教的伊斯兰国家，阿舒拉日是什叶派第三个伊玛目侯赛因在卡尔巴拉殉难的纪念日，是伊朗最重要的一个宗教忌日。每到这一天伊朗全国都会举行宗教纪念活动，悼念先贤，很多游行的青年男子用带有锋利刀片的铁鞭把自己打得鲜血直流，甚至导致感染和死亡。包括伊朗在内的一些什叶派国家颁布禁令，不允许这样做。伊朗政府和教法学家也反对民众在阿舒拉日的自残行为。巴列维国王时期颁布法令禁止在街道游行，后来四十年代又允许游行，但必须要提前报备。一个多世纪以来，有二十多个大教法学家提出禁止自残流血，现任领袖哈梅内伊明确表态，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的行为是违反伊斯兰教精神的，应被禁止。所以从立宪革命，到现代化转型，到

伊斯兰革命后的当代历届政府均反对民众在阿舒拉日的自残行为。但这一现象一直没有绝迹，也体现了制度与习惯之间长期角力的关系。近年来，伊朗面临着复杂的国际格局和地缘政治格局，为了避免将伊斯兰教与血腥连接起来，维护伊朗的国际形象，伊朗政府禁止阿舒拉日的自残行为。刘老师总结是：制度试图抑制什叶派特有的哀悼和过激行为，但屡禁不止，原因复杂，行为主体是教育水平不高的年轻男子，他们对自己的行为在国际上造成的影响没有认知。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伊朗包括什叶教派在历史上不断受到外族入侵和文化整合，产生悲情心态，不惜摧残身体，来悼念过去悲惨的集体记忆。在当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伊朗保持敌视态度，而包括沙特在内的地区大国与伊朗进行竞争，伊朗民众的危机意识很强，阿舒拉日的游行也是伊朗民众对这种集体意识的一种宣泄。还有一些对伊朗现政府不满的民众借助游行发出诉求。这些原因导致伊朗政府的禁令没有发挥太大作用。

刘老师最后总结，从这两个案例看，伊朗的习惯与制度之间的互动由很多深刻的原因来决定。而从农业时代向近现代过渡以来，主导形态是伊斯兰什叶派信仰。伊朗政府足以维持伊朗社会的稳定，但是面对公民对现代化诉求的时候在体制内进行制度理论的创新这是伊朗未来政治发展的主线。制度与习惯长期角力，此消彼长，伊斯兰革命后数十年伊朗什叶派教法学家对伊朗多元社会习惯不断做出折中的努力。

第四位发言的是上海《文汇报》前驻伊朗记者孙华，他发言的主题是“从伊朗土耳其关系演进看两国战术异动”。他从媒体视角，简单回顾伊斯兰革命胜利后伊朗与土耳其的关系，看待近两年两国关系的变化。

首先，伊朗与土耳其同为地缘大国，从2016年下半年起，两国政经关系得到改善，尽管双方互动合作增加，但是分歧仍然存在，本质是战略目标的对立，未来将呈战略竞争关系。接着他将伊朗与土耳其的关系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到2002年，伊斯兰革命产生的政体改变了伊朗发展的道路，也影响了地区格局的演进。将土耳其和伊朗关系带入新的敏感阶段。这24年中的关系主要以对抗为主，伴以短期的合作。大致受到四个方面综合因素影响。一是意识形态，伊朗新政权带有强烈意识形态特征，向外输出革命，引发土耳其和其他周边国家恐慌。1980年9月时任土耳其总参谋长埃夫伦发动政变，有意将内部危机转向外部矛盾。于是一方面是伊朗向外输出革命，一方面是土耳其对外转移危机，加剧两国对抗与竞争。90年代初期，土耳其民众的伊斯兰主义倾向上升，1996年埃尔巴坎领导的福利党在大选中胜出，组建联合政府，出现了一个短期的与伊朗改善关系的阶段。将伊朗作为首次出访国家，签署能源贸易大单。但很快由于土耳其世俗政治精英和军队将领发动政变，两国关系恶化，互相召回大使，降为代办级。在伊朗方面，1997年哈塔米上台，淡化意识形态，强化现实主义，双方关系相向而行。二是经济发展需要促进双边关系。1983年厄扎尔在大选中胜出，成为土耳其总理，将重建经济设为首要任务，在两伊战争中土耳其中立，没有参与对伊制裁，成为伊朗愿意与土耳其发展关系的政治前提。第三，土耳其政局变化影响双边关系，伊朗在伊斯兰共和国政权模式下，政治局势连续稳定，土耳其则政局变化频繁。厄扎尔1993年逝世以后在继任者德米雷尔担任总统七年中一共出现五位六任总理，非宗教亲西方势力在领导层得到加强。双方关系淡化，经贸交流下滑，土耳其舆论界反伊朗倾向强化。第四，土耳其外交关系变化影响双边关系，伊朗的外交政策有较强的连续性，在霍梅尼逝世后更具现实色彩。而土耳其受世界格局和国内政局影响，外交相对富于变化。在厄扎尔和德米雷尔两任总统执政期间，土耳其优先发展同

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伊朗被置于无需发展关系的地位。土耳其九十年代中后期大力发展同以色列的关系，使以色列通过地中海进入土耳其领空。孙华认为这一时期两国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伊斯兰主义和世俗主义之间的对立，两国政体之间的矛盾，地区影响力的竞争，同其他国家特别是域外大国关系的分歧。这之间还牵涉到两国互相支持对方国内恐怖主义的问题。

第二阶段是2003年到2015年，两国关系快速升温后转冷。埃尔多安2003年担任总理，从此开始了埃尔多安时代，这12年间以2011年中东剧变特别是叙利亚危机为转折点，割裂为两个小阶段。2003年到2010年表现为快速升温，持续走近。开始时土耳其方面非常谨慎，一方面无意破坏与美国和西方已经取得的外交局面，另一方忌惮国内的世俗主义势力。伊朗方面改革派政府淡化意识形态，但仍对土耳其伊斯兰主义政府充满期待。在一些因素促进下两国开启了一个友好和平的阶段，这些因素涉及地区变动推进两国走近：9.11以后两场战争增加两国的不安全感，反对伊拉克分裂和库尔德独立，对美国的军事存在表示警惕，等等。埃尔多安执政后施行基于共同安全，政治对话，双边经贸，文化联系等一系列因素的地区政策框架，民众与政党向心力增加。土耳其加强地区介入程度，重返中东，在这样的背景下两国因为缺乏互信，而表现谨慎，又希望加强交往，务实选择合作领域。2004年两国在安全，经贸和能源，核问题以及政治四个领域进入加强合作与互信的新阶段。第二小阶段是2011年到2015年，突然变冷，僵而不破。中东剧变导致域外大国在中东加剧竞争，美国战略收缩，俄罗斯重返中东，美国对地区控制力减弱与俄罗斯影响力上升形成对比，美国与地区盟友疏离，俄罗斯同地区伙伴亲近，形成鲜明对比，地区国家关系变化，伊斯兰国坐大；在这样背景下，土耳其与伊朗关系进入新阶段，一是在叙利亚问题上针锋相对，二是在伊拉克的暗战，三是两国对伊斯兰国的态度对立，伊朗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

战略，土耳其则长期采取姑息养奸策略和暗度陈仓的做法。这一时期双方关系变冷但没有破裂。2013年鲁哈尼胜选以后双方高层互访接触增加，2014年两国关系回升，埃尔多安构建的穆兄会新月地带被斩断，土耳其与沙特反目，伊朗方面鲁哈尼有意改善周边关系。中东地区剧变说明从意识形态视角观察和展望两国关系具有局限性，两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对立实质是战略目标之间的冲突。伊朗在两场战争后逐渐确立了伊斯兰世界什叶派领导地位，土耳其方面正发党初期同西方的良好关系掩盖了其伊斯兰主义倾向，埃尔多安将中东剧变看做推广其模式的时机，成为土耳其政策的出发点。

第三个阶段从2016年开始到目前为止，土耳其政变成为两国关系转暖节点，双方均有改善关系的需要。现实需要助推调整，土耳其面临难民问题，政治危机，安全威胁，于是主动做出外交调整，与以色列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与俄罗斯改善关系。伊朗方面核协议转化无果，鲁哈尼政府无法将其转化为急需的经济利益，但促进俄罗斯与伊朗的接近。特别是俄罗斯在叙利亚军事介入后，使伊朗在地区安全问题上优势地位明显。一方面土耳其需要调整外交政策，改变双边关系，另一方面伊朗对土耳其在伊核问题上发挥作用抱有期望，此番调整为顺势而为。两国求同存异，加强协调，在具体问题立场上相左，但谋和的意愿与协调步调的动作增加。在叙利亚问题上，土耳其与伊朗相互理解，增加让步。在伊拉克问题上两国意图相对，但在防止库尔德人独立这一点上立场一致，但在同以色列和沙特的关系上两国各行其是。在经贸问题上两国密切合作，到2014年，土耳其已经成为伊朗第四大贸易伙伴。

总结：土耳其与伊朗在战略战术层面上分歧广泛，本质上是目标对立。两国目前非敌非友，未来将呈长期战略竞争关系，但竞争中不排斥合作，问题可控，未来将共同探索由地区国家解决地区问题的新模式。

讨论环节

吴冰冰：特朗普退出伊核协议总体上对中国有利，如何将它变成现实？

田文林：首先，研究中东问题有一个如何看待伊朗的问题，如果我们采用美国的标准，会从感情上对他们很排斥。我们如何看待这些国家，持什么立场，应当从我们的利益出发。我们对伊朗，不是因为这个国家政教合一政体是好还是不好，或者伊朗是否听我们的话，而是这个国家分散了美国的注意力。我们提到的战略机遇期基于这一点。911事件，入侵伊拉克不是我们鼓动的，我们是客观享受而不是促成机遇期。第二点，从伊朗来说，它的处境值得我们同情，让伊朗撑下去对我们有好处，也是符合道义原则的。伊朗的短板是经济，而经贸合作是中国的长项，我们能确保伊朗正常的经贸往来，帮助伊朗石油贸易，这对伊朗是很大的帮助。

陆瑾：我上午阐述了中国应该帮助伊朗，这本身就站在道义立场上。但是企业不管道义，只管自己的盈利。昨天法国道达尔公司撤出伊朗，这非常不对，欧盟已经明确表态。中国很多人都以为中石油会接它的股份，因为这是道达尔、中石油、伊朗三方合作，伊朗为了把欧洲人拴住，要求我们把道达尔拉进来。现在法国跑掉了，这个股份我们接不接？我刚听说中石油是不接的，但有人说接，我也没法确认。操作过程中企业都是企业行为，不会考虑国家战略。国家不提供补偿和补贴，国家不承担风险损失，损失是突如其来的，我们有经验和教训。2011年全面金融制裁，只剩下中国企业在伊朗市场，伊朗人认为我们在制

裁期间获利巨大，但并非如此。结束制裁以后，没有给我们优惠政策，全部给了西方。我们做出巨大的牺牲，但没有得到很大的收益。在伊朗搞项目开支巨大，没有银行支付体系支撑，很困难。第二个困难，我们的大项目都有西方设备，涉及到被制裁的问题，只要美国出手制裁，我们仍然没有资金。伊朗不买我们的好，我们的项目拖延了时间，按照违约罚我们，过去的事有教训，现在我们敢做吗？涉及到企业的利益，大家都是逐利的，所以很困难。

钱乘旦：以我对中东的粗浅认识，除了国家与国家问题以外，还存在很多因素，比如宗教和民族问题。宗教的差异和冲突，民族的差异和冲突，国家的差异和冲突，地区和地区外的差异和冲突，这些因素纠缠在一起。请问：这些因素中哪一个决定地区的走向？

丁一凡：钱老师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在考虑错综复杂的问题时一定有一个主要矛盾，主要矛盾一定有一个主要方面，这样才能解决问题。中东最主要矛盾还是大国问题，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等持续了上千年，但没有演化成大规模的种族屠杀和战争。出现矛盾还是由于大国要干预，大国利用这些矛盾。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东被欧洲大国瓜分，美国继承了帝国的做法，制造民族矛盾、宗教矛盾，从而保持它们在当地的优势，今天各种矛盾好像很突出，但是最后促成这些矛盾的还是大国。大国竞争，实力比较强的是美国。所以主要矛盾是大国之争，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美国。美国把中东看做控制其他国家的手段，中东是全球的能源库，是全球商路的交通枢纽，谁控制了中东谁就控制了潜在对手的命脉。从这个角度看，美国人才愿意介入这一地区。美国主要依靠以色列，制造不安定，

维持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从而控制了它的对手如中国和俄罗斯的命脉。如果把美国这一因素解决了，其他因素都会比较容易解决，如宗教矛盾都不会这么不可收拾。

钱乘旦：我接受丁老师的看法，一个军事家应该明确主要打击目标，如果美国意识到中国是挑战，那么它的矛头就应该集中。在中东挑事就是四面出击，两面受敌，这是兵家大忌，这是在做傻事。

田文林：特朗普政府缺乏战略思考，美国有大战略，美国一定要在中东存在，要有军事基地，有美国的盟友，各个方面，通过各种方式，把伊朗塑造为敌人，这是它大战略的一部分。现在特朗普政府做事有点五个手指头按跳蚤，哪个都按不住，这不是美国的战略体现，而是这个政府的特殊状态。一个不靠谱的总统，身上背着很多污点，司法调查不断，这种情况下很多决策是为了国内政治，通过国外事件代替国内焦点，甩掉自己的包袱。所以现在很多外交政策不够理性，很不合理。特朗普做事主要是为了甩掉自己的包袱，所以不是理性的做法。

田文林：我非常同意丁老师的说法，民族宗教问题不是中东问题的症结所在。基辛格说中东问题是一个现代问题，不是古代问题。外部因素主要是大国博弈。我认为对中东地区伤害最大的是英国，在一战结束后通过塞克斯-皮柯协定将中东完整的地缘版图划分为若干小国。中东地缘版图碎片化是中东问题的总根源。1917年贝尔福宣言让以色列建国，埋下了巴以问题的祸根。为什么现在外部力

量介入如此容易，因为中东国家相互内耗。地缘版图碎片化是导致中东现在所有问题的根源，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由此决定了我对中东的结论总体比较悲观。

金良祥：我认为民族和宗教问题被夸大了，对中东影响最大的是它的破碎，中东的地缘位置极端重要，被称为三州五海之地，中东航空公司极其发达，生意火爆，原因是地理位置重要，转机的人很多。因为位置重要，大家就去争夺。当这里是一个统一的帝国时，那就是优势，可以不断对外辐射，但当它分裂破碎以后，就变成严重问题。中国晚清曾面临与奥斯曼土耳其一样的命运，但中国的政治精英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维持了国家的统一。奥斯曼帝国则被英国人解体了。另外还有一个是宗教因素，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我认为这个因素被政治化了。现在沙特和伊朗在中东利用宗教扩大势力范围，不像美国和俄罗斯使用军事和经济手段。我还想谈一谈中国企业在中东的安全问题，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企业发展很快，巨大的经济来往和人员往来，基本没有发生安全问题，因为我们和地区人民相互尊重，没有沾血，也没有不尊重别人的宗教信仰。

同学：国企在推进中国利益在中东的扩张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国企和中央政府层面是否会招募更多具有专业背景的人才进入决策层，进行政策规划？

丁一凡：你所说的确实是一个缺憾。我们企业的行为都是市场行为，跟着市场走，有时是国家合作，国企是执行单位。国企在这一地区没有什么战略考虑。外交部也缺

乏如何利用综合手段完成他的目标，外交部也不怎么搞中国的国际战略设计，这是很缺憾的。但是外交部现在在补课，成立了很多咨询委员会，但是还不能与美国国务院和英国的 foreign office 相比。但是在未来也许智库可以提供好的主意，无论美国政府和企业都依靠智库，所以以后不太可能是企业搞研究部门。以后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会把研究工作承包给智库，我出钱，你给我提供研究报告，我来考虑是否采纳。未来更可能是这种方向，

孙华：请问陆老师，核协议给伊朗带来了什么？中国从核协议中有什么获益？

陆瑾：你说伊核协议对鲁哈尼政府是无果的，我不赞成这一看法。因为它取消了联合国制裁，对于伊朗来说，民族尊严非常重要。伊核谈判是从 2002 年开始的，一直在避免联合国制裁，而且每到关键时刻就退一步走两步，坚持不被联合国制裁。内贾德带来了四个联合国制裁，这对伊朗人来说民族尊严的问题，在国际社会上给伊朗带来了诸多不便，无法加入上合组织。如果没有好处，伊朗人早就不干了，在伊朗反对核协议的是少数，反对核协议的强硬派是少数。哈梅内伊是很睿智的人，在鲁哈尼上台前就在推动核协议，只是西方人不接受强硬的内贾德政府，不和他们签核协议。鲁哈尼上台以后，美国人开始与伊朗直接交谈，这个协议对伊朗十分重要，也是它现在不能退出伊核协议的原因。2011 年但凡伊朗能挺过去它就不会签署。但是它不行了，在没有国际金融制裁，在油价那么高的情况下它都没能撑过去。这也是为什么伊朗不能退出，一旦取消，联合国的制裁是能够恢复的，这对伊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美国打了两场战争，以后伊朗重新规划外交政策，搞地区主义政策，在地区把影响力坐大，为了避免围堵，核计划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使自己成为有世界影响的国家。内贾德的政策导致了制裁，激怒了哈梅内伊，这关系到伊朗的尊严。如果没有伊核协议，伊朗的石油仍然是零。伊朗是靠石油收入来支撑的，虽然只占国家GDP的三分之一，但政权体制的最大受益都在石油收入中。老百姓没有收益，不等于国家没有收益，解除制裁以后国家是有收益的，老百姓没有收益，分配不公，利益集团更富了。

程彤：核协议的签订使伊朗政府的合法性得到联合国的承认，释放了一个信号，就是可以去伊朗市场做生意。这是前提。中国和欧洲大批游客去旅游，游客带来的是真金白银，因为旅游是带现金的。通过核协议这个突破口可以发展旅游。旅游，运输都能得到发展，改善鲁哈尼的经济状况。

同学：如何理解特朗普政府与犹太游说集团之间的关系，以及两者的关系是如何作用于美国最近的政策？

田文林：我这里有一本米尔斯海默的书《犹太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里面把这个问题说得特别清楚，作者担心美国的对外政策越来越被犹太游说集团所左右。我补充一点，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就说过，美国不是美国人民的美国，而是垄断集团、金融资本集团的美国。我去年写过一篇文章，“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战争与和平”，发表在中央编译局的《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杂志上，对这个问题有很细的解说，具体内容就不说了。

最后还有一分钟时间，我说一下国别区域研究的问题。刚才有同学说要加强翻译，这个问题上我非常同意程彤老师的意见，我们的国别区域研究首先要借鉴，但不是建立在西方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要致力于中国立场，中国学派，中国风格。西方的社会科学很多是建立在唯心史观基础上的，我们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引进的很多书籍里这个问题特别明显。强化国别区域研究，历史研究很重要，政治学研究也很重要，经济学的知识也很重要。几个方面综合起来，才会对一个国家有比较完整的了解。

总结

钱乘旦：一天的会听下来，收益良多，学到了很多新知识。我很热爱新知识，我觉得我们的区域国别研究需要有很宽的知识面，把知识面拓宽以后，无论是就某一个点或者某一个地区、某一个国家进行研究，宽阔的知识面就能给你很大的帮助。今天我们讨论了很多重要问题，有一些是基本理论问题，也有一些是技术性强、应用性强的具体问题，会后，我们会非常详细、原原本本地把各位的发言整理出来，做一个总结。以后还会有很多方面向各位请教，期待大家进一步支持。



记录、整理：赵心悦、纪景闻、张江龙

审稿：张璩

终审：钱乘旦